



西南社会历史论丛

XI'NAN SHEHUI LISHI LUNCONG

吴达德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西南社会历史论丛

吴达德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南社会历史论丛/吴达德主编.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220-07867-5

I. 西… II. 吴… III. ①社会发展—西南地区—文集
②西南地区—地方史—文集 IV. K29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7605 号

XI'NAN SHEHUI LISHI LUNCONG

西南社会历史论丛

吴达德 主编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王定宇
文小牛
戴雨虹
叶 勇
丁 青 李 进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上翔数字制印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146mm×208mm 1/32
7.25
200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07867-5
20.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序

加强地区史和地方史研究

吴达德

自从“人猿相揖别”，就开始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历史，不仅是由时间运动构成的，也是由空间运动构成的；历史的向度不仅是纵向的，也是横向的。历史就是由纵向的时间运动与横向的空间运动相互交织的立体结构。以一定的地域范围来研究社会及其发展的历史，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实践效用都是十分必要的。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曾经有过 1300 多万平方公里的陆上疆域，当今也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陆上领土，在这广袤的土地上，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历史以来，不仅以行政区划为空间的社会历史研究十分流行，而且跨行政区划的社会历史研究也备受关注。

何为“地区”或何为“区域”，学术界并无统一的划分标准。国内经济史学界曾对历史上经济区域的划分展开过讨论，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以行省作为区域划分的基础或主要标志；（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3）采取多元标准，即可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在借鉴经济史学界关于区域划分标准的基础上，我们认为：

地区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我们所谓的地区是指在地理条件上相同或相近的一个区域单位。中国幅员辽阔，相邻的几个省区由于大致相同的自然、气候、植被、物产、民族分布以及交通状

况等地理条件，自然地历史地形成一个包含数个省区在内的联系密切而又相对独立于其他区域的地区。比如西南、西北、东北、华中等地区。地区的各种自然地理条件，不会因为人类社会历史的推移而发生大的根本性的变化。今天人们又提出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等概念，这些概念首先也是一个地理概念。

地区还是一个文化概念。在相对独立而又区别于其他区域的一个地区内，除了地理上的因素外，其饮食、服饰、年节、丧葬、婚俗、宗教信仰、房屋建筑等风俗习惯，大致相同或相似。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地区文化特征和风格，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中，呈现出一定的地区特征。

地区又是一个政治历史概念。一个地区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中国历史上，有着把所辖范围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因素并参考其方位划分为若干行政区域的传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地区的名称及其范围虽然时有变化，但地区概念和内涵却在不断地明确和完善，并逐渐地为人们所接受。我们所谓的地区概念，正是历史上逐渐形成和固定下来的而不是人为的随意割裂和拼凑出来的。

除此以外，地区概念还具有经济上的内容。由于各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植被物产状况各异，使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必然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地区经济特征。

所谓地区史，就是指自然地理条件大致相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基本同步，内部联系比较密切，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包含或涉及数个省区在内的地区的历史。

地方史比地区史更好理解和更能为人们所接受。地方史就其空间范围讲，比地区史要小得多，且一般是按一定的行政单位（如省、州、郡、县、市、区或更小的行政单位）来进行研究。地方史研究的或是一个行政单位历史发展过程的全面的状况，即地方通史；或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侧面，如政治、经济、文化、

民族等方面的历史，即地方专题史；或是某一时间断限内的历史，即地方断代史。近几年来，地方史的研究逐渐为人们所重视，不少省区、市县乃至区乡，都编写（撰）出各自的地方史（志）；一些大中城市的城市史或史话亦相继问世，为史学园地增添新的门类。

从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看，在中国古代的史学研究中，就已经有通史、地区史、地方史（志）、专题史之分。《史记·西南夷列传》开地区专题史研究之先河。司马迁把民族问题的考察和研究放在一个地区的范围来进行，可以说是地区史研究的一个大胆而成功的尝试；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与《史记·西南夷列传》相比，则是一部更为成熟的地区史，它不再仅限于民族问题，还涉及了地区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等许多领域。我国是一个有大一统悠久历史的国家，向来有严密的多层次的行政结构，编史修志的传统源远流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推行确立了郡县制。东汉光武帝诏修《南阳风俗志》，开州县志之先河。然而在五代以前，郡县大多无志。自宋代起，地方经济发达，郡县之志渐为普及。从元代开始，施行行省制度，故省志从元代开始。到了明、清两代，省级以下有府、厅、州、县的行政建置，于是相应的产生府志、厅志、州志和县志，其中，以州志和县志最多。县以下还有乡志、镇志等等。地方史和地方志虽有所不同，但在空间范围内是一致的。“志为史裁”，“志乃史体”，“一方之志”就是“一方之史”。方志囊括了一个行政单位自然和社会的古往今来，那么在广义的意义上讲，方志当然应当纳入史学的范畴。因此，我们可以把地方志归类入地方史的范围之内。

在世界历史领域，很早就有一个把专门问题放在地区范围内进行考察研究的传统。《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高卢战记》就是其中的突出例子。在当今，也有世界通史、地区史（欧洲史、非洲史、中东史、拉丁美洲史、东南亚史、南亚史等等）、国别史、专

题史之分。

20世纪西方史坛最富盛誉的法国年鉴学派,从地区或区域角度进行研究的论著占有突出地位。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的名著《腓力普二世与法兰西康德地区》是典型的地区性研究著作;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腓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至今被视为地区社会史研究的典范;第三代学者中最具影响的地区性研究著作应该是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与博韦人》,以及马纽埃尔·勒鲁瓦·埃迪里的《朗格多克地区的农民》;第四代学者中G.杜比的博士论文《11—12世纪马贡地区的社会》等均有相当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倡导以中国社会内部为出发点,“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研究中国历史”,“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这是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的两大特征。在“中国中心观”为主流的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黄宗智和施坚雅的地区或区域社会历史研究令人瞩目。黄氏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在美国史学界很富声誉,其研究“重点在于一个特定区域和社会阶层”。施坚雅在对晚清城市的一系列研究中也以地区或区域为出发点。在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除以“大区”为范围的地区或区域研究外,对省一级的研究“犹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对府(州)、县乃至村落的研究也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关注。

这些不同空间范围、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史学研究,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互相依存,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貌,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推动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发展。

进行地区史、地方史研究,首先必须搞清楚通史、地区史、地方史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地区史、地方史与通史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地区史、地方史相对于通史而言属于微观方面的研究，因为它涉及的仅仅是一个地区、地方的历史。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些事件、人物和有些问题在全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影响不大，甚或微不足道，但是在某一地区则不可忽视，这样的事件、人物和问题不胜枚举。中国通史是由若干专题史、地区史、地方史提炼综合而成。因此，离开了对地区史、地方史的研究，整个中国历史、中国通史的研究就会只有骨架，而无血肉。地区史、地方史研究是宏观的中国通史研究的基础，只有在局部地区史、地方史全面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写出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中国通史，才不至于使通史的研究空洞而贫乏。地区史、地方史研究又是在通史研究的总体思想和总体框架的指导下进行的，它只是通史研究的一个侧面、一个局部，它不能也不可能代替通史研究。地区史、地方史的研究如果不放置于通史的范围之内，它也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显得单薄、孤立。

地区史与地方史的关系，也是局部与整体、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关系。相对于地方史研究而言，地区史则属于宏观研究领域。因为地区史不仅要研究发生在本地区内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历史人物，而且还要把握整个地区历史发展的全貌，更重要的是它必须从地区内各地方历史发展中找出本地区历史发展的共性和规律性。因此，地区史研究对各地地方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地区史研究的加强有助于各省区地方史研究的深化；反之，地区历史发展的轨迹，要依靠地方史去研究探讨。

地区史研究是联结通史和地方史研究的一个必要的中间环节，它处于中间层次，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处于一定相互联系中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整体，是一个系统，各个组成部分都按照一定的顺序组织起来而不是杂乱无章地堆积。如果我们把中国历史及其研究看做一个大系统，地区

史就这个系统而言是子系统；而地区史相对地方史而言是母系统，地方史又是子系统。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最近几年，地区和地方社会历史的研究涌现了许多新的成果。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地区史和地方史研究还未受到应有的足够的重视。由于忽视了地区史的研究，史学研究中许多问题未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答，研究评论时常常失之偏颇，阻碍了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比如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事件、人物的影响，虽然不是全国性的，但在一个地区或地方确是颇有影响、颇为突出的；又如中国近代史就全国来说是1840年鸦片战争揭开了它的序幕，但各个地区、地方进入近代的具体年代或标志，会因其具体历史情况的不同而各异和有所差别；再如我们常常笼统地说中国历史上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又缺乏对这种不平衡状况作具体的深入的质和量的分析。因此，在研究中论者往往各执一端，各持己说，甚而以偏概全，结果是争论不休，纠缠不清。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应该考虑从地区史和地方史研究入手，在地区史和地方史研究的基础上寻求比较符合历史客观实际的答案。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个地区、地方由于自然地理和历史条件的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沿海和内地、中原和边疆、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水平差距很大。因此，通史研究中探寻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能具体地说明每一个地区和地方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地区和地方历史发展的轨迹，主要依靠地区和地方史研究去探寻。地区史和地方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应有它的相对独立性，通史不可能取代得了它。地区史、地方史的分期及阶段划分，应该参考中国通史的划分，但是不能生搬硬套，强求一律。既不能把地区史、地方史搞成中国通史的机械缩写，也不能把中国通史

搞成地区史、地方史的简单拼凑，这些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现代史学的发展既要求我们对社会历史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系统性的、整体性的研究，也要求我们进行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要全面认识一个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及其规律，既要有宏观方面的掌握，也要有微观方面的分析；既要有纵深的历时性的探源寻根，也要有横向的共时性的比较推断；既要用一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明地区和地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也要用地区和地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来体现一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既要使纵向的历时性考察和横向的共时性研究相结合，也要让一般性原则和特殊性原则达到辩证的统一。

目前进行地区和地方史研究的条件已经具备和成熟，人们已经自觉地有意识地把一些人物、事件放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即地区和地方来进行考察研究；各地方史（志）的编写和研究，各地区和地方专题史的研究和深入，为地区史和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良好的条件。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地区、地方经济的发展对历史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地区史和地方史的深入研究不仅对全国通史的研究大有裨益，还将对地区经济和地方经济的开发、发展，对全国经济建设的战略总体规划和地区、地方经济发展规划提供历史的依据和历史的借鉴。



目录 CONTENTS

试析民国时期国人进入西康考察的背景/曹春梅	(1)
一、西康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西康地位的凸显	(2)
二、中国边疆研究的高涨及现代学术研究的发展	(9)
三、刘文辉主政西康及其对文人的欢迎	(21)
抗战时期国统区防护团的团员构成及其训练/黄辛建	(30)
建国初期四川的禁毒运动 (1950—1952) /罗兰英	(51)
一、历史背景	(51)
二、禁毒初战 (1950—1951): 三禁并举, 重在禁贩	(57)
三、禁毒决战 (1952 年 1—12 月): 统一行动, 重点 突击	(67)
四、制胜法宝	(76)
公共卫生与都市生活	
——以成都市政府卫生事务所为中心的考察 (1941—1949) /米晓燕	(84)
一、成都市政府卫生事务所与都市生活的关系	(85)
二、成都市政府卫生事务所与传染病的防治	(105)
三、结语	(117)
抗战时期重庆的难民问题/彭红碧	(122)
一、抗战时期重庆难民的概况	(122)
二、抗战时期重庆难民的救济机构及其政策	(129)

三、抗战时期重庆难民的救济措施	(132)
四、抗战时期重庆难民的救济效果	(140)
五、小结	(146)
1940 年代川西袍哥团体研究/王方	(148)
一、1940 年代川西袍哥团体概况	(150)
二、公益协进社——干预地方政治	(152)
三、唐安总社——军官、土匪、袍哥、政客、地主的 多重组合	(157)
四、从蜀和公司到汉华社——新型经济活动的尝试 ...	(161)
五、大中社——特务、袍哥、记者三位一体	(166)
六、结束语	(170)
基督教与川西羌族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	
——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为例/汪洪亮 ...	(173)
一、作为“边疆”的川康地区及川西羌区的文化教育 ...	(175)
二、作为“社会福音”的边疆服务及其教育事业	(179)
三、川西羌族地区边疆服务中的教育工作及其特点 ...	(183)
四、基督教对川西羌族地区文化教育发展的作用与影 响	(190)
国民政府时期四川省的救济院研究/熊维林	(197)
一、救济院的建立	(197)
二、救济院经费来源与开支	(200)
三、救济院的业务	(206)
四、救济院的社会作用	(218)

试析民国时期国人^① 进入西康^②考察的背景

曹春梅

摘 要 民国时期国人对西康的社会考察。是近代西康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反映，是中国边疆考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从西康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西康地位之日益凸显、中国边疆研究的高涨及现代学术研究的发展，以及刘文辉主政西康及其对文人的欢迎等层面，讨论民国时期国人进入西康考察的时代背景。

关键词 民国时期 国人 西康 背景

在古代、近代社会，中国地方辽阔，兼之交通工具极不发达，所以对于边疆情形就隔阂甚深，甚至有些时候声气不通，消息全断。到了民国肇兴时，又是军阀割据，各霸一方，都只顾一己之

①由于西康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特点以及国内国际形势，在民国时期，我国大量学者（包括高校师生）、政府官员和外国学者、探险家多批次进入西康地区，进行了学科门类众多、涉及领域广泛、社会影响较大的考察活动。限于时间等因素，本论文只拟研究入康考察之国人。“国人”本指中国人，在本文中，笔者所谓的“国人”限指民国时期进入西康考察的非西康籍的中国人。

②西康，简称康，为民国所设省份，于1955年撤销。拥有33个县和3个设治局，其中“康属”（今四川甘孜州境域）有康定、新龙、泸定、炉霍、甘孜、道孚、丹巴、九龙、雅江、理塘、稻城、乡城、得荣、巴塘、义敦、白玉、石渠、邓柯、德格19个县和泰宁设治局；“宁属”（今四川凉山州境域）有西昌、会理、盐源、盐边、宁南、昭觉、冕宁、越西8个县和宁东设治局；“雅属”（今四川雅安市）有雅安市、荣经、汉源、天全、芦山、宝兴6个县和金汤设治局。

私利，致使外蒙被人强食，新疆、西藏成分割之局，西康、青海几乎成为无主之地。这样的边患危机，必定会唤起一些国人的觉醒，引起他们对边疆的注意。

西康地处西南交通要道，进可为西藏后援，退可为四川屏障，左右则能与青、滇策应。早在明、清时期，该地就已经是中央政府控制藏、彝等少数民族的军事战略要地。无论是清末时期的筹设川滇边区，还是北京临时执政府 1925 年 2 月设立的西康特别行政区以及后来国民政府 1939 年 1 月的西康建省都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西康的重视。当然，它也受到外来势力的关注。特别是民国时期，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西康更成为全国的焦点之一，各界人士纷纷涌入西康，去了解这一神秘地带。

随着边疆研究与藏学研究的繁盛，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藏区，但研究者的视角多放在西藏地区，对西康地区涉及较少，特别是民国时期国人对西康的社会考察。迄今为止，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无论从历史学的角度，抑或社会学、民族学的角度，都未引起学术界的应有关注和足够重视，尚未见讨论这一课题的专著，研究的论文也比较少。本文中笔者拟对民国时期国人进入西康考察的背景加以探讨，希望能为民国时期西部边疆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为今天藏区的建设提供宝贵的参考资料。

一、西康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西康地位的凸显

（一）西康特殊的地理位置

从地理位置来看，西康外联印缅，内屏四川，与西藏若唇齿之依，于云南、青海有高屋建瓴之势。因其处于连接西藏和内地的交通枢纽地带，故成为历代中央政权对西藏施政中，传递政令、运输军事战略物资和补给粮饷兵员的要津，也是西藏地区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与往来的主要通道。早在明、清时期，该地就已

经是中央政府控制藏、彝等少数民族的军事战略要地。无论是清末时期的筹设川滇边区，还是北京临时执政府 1925 年 2 月设立的西康特别行政区以及后来国民政府 1939 年 1 月的西康建省都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西康的重视。

交通便利的优势，使西康成为历代中央政权治理西藏的依托。因西藏穹远，交通不便，声息不灵，控驭不易，紧邻西藏的西康便自然而然地成为经营西藏的战略据点。“有西康可以谋西藏，无西康则川滇之藩尽撤，更无论于西藏也。”^①历史上本有青海、云南、四川三条进藏道路，“惟云南中甸之路峻峨重阻，故军行皆由四川、青海二路，而青海路亦出河源之西，未入藏前，先经蒙古草地千五百里，又不如打箭炉（今康定）内皆腹地，外环土司，故驻藏大臣往返皆以四川为正驿，而互市与贡道亦皆在打箭炉。”^②并且“打箭炉在大渡河外直黎雅之西，自理塘、巴塘以西，直抵西藏……而打箭炉实为诸番朝贡、互市之要口。”^③由此可见，正因为青海、云南两条入藏道路的艰难，才使由打箭炉途经理塘、巴塘、察木多（今西藏昌都）、拉里（今西藏嘉黎）等地进到拉萨的川藏大道成为清政府控制西藏的一条生命线。来往于川藏者日益增多，而联系亦日趋频繁，“今四川的康定、甘孜、德格、理塘、巴塘至西藏的昌都一线，成为康区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④，看来也并非偶然。

西康除了因其为内地与西藏交通枢纽而著名外，还因其处于青、甘、川、藏、滇藏区交会地带，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迁徙频仍的“民族走廊”中段而地位更加突出。因为众多民族北上南下迁徙必经此地，也使其成为西北与西南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孔

①黄国璋. 西康在我国国防上之地位 [J]. 边政公论, 1941, 1 (1): 40.

②黄沛翘. 西藏图考. 卷二 [Z].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2, 78.

③常明、牛芳灿等. 嘉庆四川通志 [Z]. 成都: 巴蜀书社, 1984, 1262.

④任乃强、任新建. “朵甘思”考略 [J]. 中国藏学, 1989, (1): 135—138.

道。汉藏民族交往史上有名的“茶马互市”，西康更是重要的区域和口岸，不但成为加强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而且也逐渐彰显西康在巩固藏区与祖国的统一、维系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政权的关系，以及沟通汉藏贸易等方面的政治、经济地位日益增强。尤其在明代，将原来纯属于经济互补的“茶马互市”提升到政治层面，作为治理藏区的一种政治手段，实行“以茶制番”、多封众建、厚赐优赏的治藏政策。为了保障茶道与贡道的畅通，明初开通了直达大渡河西岸的川藏大道，并于成化三年（1467）规定“诸自乌思藏来贡者，皆从四川入，不得径赴洮、岷”^①。

交通实为边疆发展之命脉，不仅经济发展、国防需要与之密切相关，而且政治之统一、民族之融合，尤随交通发展而俱进。这样，在中央政权的扶持下，不但西康充当了卫藏地区购茶和朝贡者与内地交往的桥梁，而且川藏大道也逐渐成为入藏正道。清代时更放松了对边茶的限制，川藏茶叶贸易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康熙四十一年（1702）清廷于打箭炉设立茶关，康定自此成为汉藏贸易的中心和集散地，以后又逐渐形成以康定为中心的入藏大道——南路的“川藏官道”和北路的“川藏商道”。由于这两条大道是川藏间的纽带，更是清廷治理西藏的生命线，故处于这两条大道中心的西康便成为清朝治藏之“依托”、控驭藏地之“锁匙”。因而，清前期，在西藏多次受新疆准噶尔部骚扰的情况下，雍正六年（1728），迁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暂时驻锡于噶达（今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乾宁地方）以避其锋，这是把西康视为“堂奥”^②又可以倚康治藏的举措。为了达到倚康治藏的目的，清廷还将西

①[清]张廷玉等撰. 明史 [M] 卷三三〇. 北京：中华书局，1974，1762.

②联豫上清廷奏折云：“现以全力振兴巴塘，尤宜以全力整顿西藏，盖巴塘为堂奥，而西藏则为门户也。”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 [Z]. 北京：中华书局，1989，172.

康东部划归四川总督管辖，直接经营西康，以四川的物资和人丁为治理西藏的后援，使其成为治理西藏的战略依托。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朝为抵制帝国主义的入侵，稳定西藏局势，统筹西康经营，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宣统三年（1911）六月十六日，傅嵩林上奏改建西康为行省，其陈述建省理由时，认为西康“界于川藏之间，乃川省前行，为西藏后劲，南接云南，北连青海，地处高原……对于四方皆有建瓴之势”，建省具有“守康境，卫四川，援西藏，一举而三善备”^①的国防意义。民国时期筹建西康省，同样也是以西康国防战略地位的重要为首要理由。^②可见，西康对于西藏的经济战略地位、对历代中央政权治理西藏之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民国时期，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西康的战略地位尤显重要。

源于这种特殊的战略地位，西康成为历代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区的前沿阵地，有识之士因而提出了“治藏必先安康”^③的战略构想。民国时期，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西康，政府部门与许多学者以团体或私人的形式进入西康考察。同时，中国边疆危机的爆发也唤起了国人的爱国热情，促使其对边疆地区的考察。

（二）近代中国边疆危机的爆发与西康地位的凸显

清乾隆末年以后，国力由盛而衰，边疆危机初露端倪。19世

^①傅嵩林。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林奏请建设西康行省折[A]。西康建省记[M]。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史地文献（第十九卷，总094辑）[Z]，359—364。

^②参阅冯有志编著。西康史拾遗[M]。康定：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内部发行），1992，70；黄天华。西康建省述论[D]。近代史资料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2002。

^③清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军机处交部复议锡良等奏设川滇边务大臣奏折时谓：“经部复议，现西藏纷乱未清，边境多事，所拟设置边务大臣，驻扎巴塘练兵，以为声援，事以可行。”时人简称之为“治藏必先安康”。傅嵩林。谨拟边务应改行省条陈[A]。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Z]。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503—506；李绍明。论“治藏必先安康”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意义[A]。李绍明著。巴蜀民族史论集[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225—242。